

# 我与花

章念驰

朝披露珠育趁月，  
满园多是手栽花。

青梅红杏白枇杷，  
豆萼垂垂垂上瓜。  
美味尝来称口福，  
不知落了几多花。

祖母最喜爱梅花与兰花(我已发表过《祖母与梅花》),她栽了九大盆兰花,夏天搬到树荫之下,几天要浇一次透水,冬天要移到客厅之中,都是她自己操劳。兰花比梅花高贵多了,它有梅花般暗香,但香味浓烈得多,开花的季节,整个房屋每一个角落都会被熏得醉人。但兰花很难伺候,祖母谢世后,它们也凋谢了。

祖母还会带我们去抽政园,和西园寺、灵岩山、虎丘等处去赏花。祖母的许多诗词都是咏花的。祖母写梅道——

无人不道买花来，  
雪蕊冰姿任意摧。  
浩荡红尘人海里，  
无端小劫到寒梅。  
又咏叹赏花惜花之情：  
流光如电去无情，  
一度看花一度春。  
人老惜花花似旧，  
花应爱惜爱花人。

我也是受她熏陶而长大的,养成了爱花的个性。

但随着国家政治气候变化,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变,母亲带着我们四兄妹搬到了仅三十平方的底层小屋,却带有一个小园子,有二十来平方,沿外墙种了两棵二层楼高的冬青树,四季绿油油。还留了一块小小的泥地,成了我的天地,养过鸡养过鸭还养过鸽子,也翻了一个花坛,种了迎春花、紫金花、凤仙花、鸡冠花,秋天的大理花,冬天的菊花,当然也少不了多刺多虫的月季与“十姊妹花”……让我陶醉其中。

后来的日子里,养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。我家的铁门被拆去大炼钢铁了,小花园也渐渐荒芜。家境越来越差,东西越来越匮乏。母亲要抚养我们四个孩子,只好节衣缩食,但她每个星期天照例要买一束花的习惯未改,多半爱买荷兰。只是后来,连少数几家花鸟商店也关门大吉了。百无聊赖之际,我以绘画为趣,创作了一幅《向往》:在房间一角的茶几、沙发上,放了一瓶鲜花,一堆书籍与笔记本,一杯好茶。这就是我的向往——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、鲜花、品茗、安宁……

改革开放后,百废待举。一次,来了一位美国金融专家,汪道涵市长要与她见面,她也很重视这样的会面。她托我们买一束鲜花去见汪道涵,这可把我们难住了,我们跑了一天,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几枝花。那时还没有花店,没人种花卖花。如今上海处处绿化成荫,到处种花植花,把城市打扮得美轮美奂,四季见花,再也不会买不到一束花的尴尬。

我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,搬了新居,而且越搬越宽敞,但都没有小花园了。于是我将一间屋子隔出了一间室内阳台,左右做了两个大花架,中间放个大鱼缸,用鱼缸水浇花。又将前后三个空调架,上面加了木板,也种起了适合户外的花,如凌霄、紫荆、三角梅、柠檬、佛手、月季、土人參、金银花等,大大小小三十多盆。

苏州家中院子只剩下五分之一了,我也已很少回家。弟弟守着园子,不少老树还活着,弟弟又栽了许多新花,每当盛开时,他都会发微信给我看,爱花的习惯一代代传承下去。爱花的人,一定善良,善良的人,一定健康,健康的人,必定长寿,我相信一切都会回归人的天性!

车程约一小时,从高架转入南庄路,迎面而来的,是一片清凉。高大的樟树夹道而行,公路两侧,成片的翠绿果园,果枝上挂满即将成熟的蜜梨和黄桃。扑面而来的清香气息,让人不知不觉安定下来,一身的暑气也散去了,清凉就这么不请自到了。汤君早就在路口相迎。疫情三年,彼此牵挂,看到他还是那么开心、健康,感觉特别的高兴。晚上去农家便餐,我在一旁喝着茶,听汤君和朋友们聊天。偶尔也会吃一点羊肉,细细品味这让我有点担心却又难以舍弃的美食佳肴。

第二天一早,赶着去看羊肉火锅与出锅。奉贤行的伏羊节有上千年历史,这里的羊肉特点之一,是白煮羊肉,羊肉没有膻气。而这却不是靠调料配方去除膻气,全靠厨师不断拿勺子舀去肉沫完成的。这是一手绝活。在新叶村一家新建的餐馆,我见到厨师在一只大锅中不断地舀肉沫。一大片羊肉被一块铁块压在沸水中炖煮,整个厨房飘

二十多年前,我在一家新办报纸任职,办公地点位于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厦十楼。大厦对门,是著名的申报馆。创办于1872年的《申报》,原馆址在汉口路江西路口,后迁至望平街(今山东中路)西首,靠近福州路。1917年,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斥资70万两银子,在望平街北侧的汉口路购地建新大楼,次年迁入办公。这幢新大楼,就是今天的申报馆。

申报馆的门牌号,是汉口路309号,老解放人都称申报馆为“309号”。那些年,解放日报还有班车,就停在309号门口,我偶尔下班会去“蹭”班车。在等车间隙,我常抬起头,打量(其实是仰望)申报馆:看上去很高大,其实楼高仅五层(部分六层);灰褐色的外墙,质朴无华,不事雕琢。门楣上紫铜色的“申报馆”三字,其时已褪去光彩,但大楼身板依然结实。它像一位老绅士,站在汉口路山东路路口,默默守候。

那时,解放日报编辑部已全部迁出了309号。申报馆底楼开过旅行社,还开过一家咖啡馆。咖啡馆店招上,写着“xx咖啡”字样,让我差点以为是错别字。后来,“xx咖啡”退出,变成了茶餐厅。那个茶餐厅,被报社同事称为“社外食堂”,人气兴旺,我们常在那里招待客人。申报馆的其他楼层,大多是一字间。其中有几间,由与我们合作的一家广告公司租用。

申报馆有两个入口:北门和东北门。申报馆一般工作走北门,餐饮走东北门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东北门,最早是申报馆的唯一入口。推开东北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,就是大厅里的巴洛克式雕花穹顶。谁会想到,这里曾经是《申报》的印刷工场。最新式的美式印报机,每分钟可印刷800份报纸。申报馆楼上,原是当年《申报》的办公场所,约有几十个



读史老张

小房间。二楼为营业厅、编辑室;三楼为经理室、编辑室、会客室和餐厅;四楼为编辑室、图书室、校对室和照相间;五楼为宿舍和屋顶花园。

申报馆刚落成时,就接待过蜚声中外的世界名人。1919年5月2日,美国教育家、哲学家杜威(John Dewey)偕夫人来访,受到了史量才的热情欢迎,陪同前来的中国学者,是胡适、蒋梦麟和陶行知。1920年10月,访日的英国学者罗素(B.A.W.Russell)下榻西藏路“一品香”旅社。16日,他沿着汉口路徒步走进了申报馆。1921年11月21日,世界报业大王、《泰晤士报》老板北岩爵士(Lord Northcliffe)一行到访申报馆。同年12月23日,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(Frank P. Glass)也前来采访。

今天的申报馆,底层开着一家The Press西餐馆。而在当年,申报馆曾在三楼自设餐厅。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曾提及,那天他在三楼餐厅,“四点左右时在那里喝了下午茶”;晚宴上吃了中国菜,有一道用米做的布丁,里面有八种特色食物,和着杏仁粉的沙司一起吃,“那味道是如此美妙,以至于我后悔当时没有多吃些……”罗素到访的当天,《申报》曾发过一则惜字如金的消息:“罗博士已定于今日午时来本馆参观。本馆当

# 推开申报馆的门

引罗博士参观各部以便领教,并略备午餐以尽东道之谊。”这最后一句,表明了对于“本馆”三楼餐厅的信心。北岩爵士到访时,“先请爵士参观全馆各部,次在三层楼餐厅宴叙。”在宴会上,北岩将《申报》与《泰晤士报》相提并论:“世界幸福之所赖,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,如贵报馆与敝报馆差足与选……”(见1921年11月22日《申报》)正是在三楼餐厅,史量才在欢迎格拉士的招待会上,发表了一段有关“本馆宗旨”的言论,颇含深意:“十年来,政潮澎湃,本馆宗旨迄未偶移。孟子所谓‘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’,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‘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’一语……似亦隐相符合,且鄙人誓守此志,办报一年即实行一年也。”(见1921年12月24日《申报》)多年以后,史量才因“誓守此志”,殒命于沪杭公路上。

当年的申报馆,藏着不少名人轶事。1919年4月,印尼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决定回国投资,却不知从何处着手。他每日必看《申报》,认为《申报》老板必定见多识广,遂轻车简从,到申报馆登门拜访。在三楼经理室,史量才接待了黄奕住一行。他初见黄奕住衣着朴素,以为对方只是一般乡绅,就向他提议,可以投资建一家银行,五十万、一百万即可。

黄奕住不屑地说,那太少了,我可以出一千万!此时史量才才恍然大悟,眼前这位满口闽南语的“乡绅”,竟是身家雄厚的印尼“糖王”……这次黄奕住到访申报馆,终于促成了赫赫有名的“中南银行”的诞生——“中南之者,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”。

1920年2月,不满十岁的杨绛随两个姐姐来到申报馆,看望她们的爸爸杨荫杭。杨荫杭时任《申报》副刊编辑,他以“老圃”笔名撰写的文字,曾深受读者欢迎。据徐铸成回忆:“我那时比较欣赏署名‘老圃’的短文章,谈的问题小,而言之有物,文字也比较隽永。”(徐铸成《谈老圃(申报)》)那时,杨绛正跟着两个姐姐在启明女校读书。一天,姐姐们带她走出校门,“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,又走了一段路。大姐说,‘这是申报馆,我们是去看爸爸!’”杨绛记得,一见到爸爸,她只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,“差点儿哭,忙忍住了。爸爸招呼我们坐坐。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,听姐姐和爸爸说话。说的什么话,我好像一句都没听见。后来爸爸说:‘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。’”“吃大菜”,就是吃西餐。等吃完西餐,他们又回到了申报馆,“爸爸带我们上楼顶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,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。”(杨绛《申报馆看爸爸》)杨绛提到的屋顶花园,就在申报馆五楼。据说屋顶花园曾养过几百只意大利信鸽,当年《申报》记者会带信鸽采访,写好新闻就让信鸽飞回,比拍电报发稿省事。不知那一天,杨绛和她的姐姐们见到了信鸽没有?

1921年7月,26岁的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,到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。纱布交易所位于爱多亚路(今延安东路260号,前上海自然博物馆),离申报馆一箭之遥。那时,邹韬奋一心想进新闻界,就与《申报》营业主任张竹平取得了联系。张竹平原是圣约翰校友,负责《申报》经营。一天,张竹平找到邹韬奋,希望他去申报馆帮忙,邹韬奋愉快地答应了。于是,每天下午六点钟以后,他就离开纱布交易所,到申报馆打工。邹韬奋回忆,他的职责是,根据张竹平口述,用打字机打成英文回函。

“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,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,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……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,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,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,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。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,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,想出了新的意思,叫你重打……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,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,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,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!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,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,总是筋疲力尽,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似的。”

就是这短短三周,为邹韬奋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做了铺垫。他自己也承认:“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《时事新报》,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。”(邹韬奋《经历》)

另外,当年申报馆还留下过不少历史之谜。例如,申报馆顶楼,史量才原是要安装电台的。据柳中熾回忆,“《申报》那时没有电台,好像与《新闻报》合用一架,不自由”,于是,史量才聘请他来申报馆安装电台,“因是秘密架设电台,我直属史先生督管,连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工钱也是他亲自交给我的。”(柳中熾《与史量才接触往事》)那么,一向谨小慎微的史量才,为什么要秘密架设电台?后来为什么又没有搞成呢?

再如,鲁迅曾与申报馆有过多次交集。1932年12月黎烈文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辑后,鲁迅是《自由谈》最有影响力的作者。最初,他是通过郁达夫联系申报馆的。据鲁迅日记记载,1933年2月3日,“寄达夫短评二”;8日,“寄达夫短评二则……收申报馆稿费十二元”。自15日起,鲁迅开始直接联系申报馆,并与黎烈文往来密切。此后的鲁迅日记中,留下了不少“寄《自由谈》稿”或“寄黎烈文信”的记录。然而,9月30日,鲁迅致信黎烈文称,日译法郎士小说等书稿,“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报馆,托梓生转交……如未收到,希往馆一问为幸”。“梓生”即张梓生,时任申报馆编辑。那么,这里的“送往申报馆”,是说鲁迅亲自到了申报馆,还是指请人代为“送往申报馆”?鲁迅究竟有没有到过申报馆呢?

巍然矗立的申报馆,原建筑呈“L”形。1930年,在申报馆旧屋之南,添建新屋一座(1946年又在上新屋上添建一层),新屋呈反方向的“L”形。新屋和旧屋之间,正好围成一个“口”字。难怪当年我从北门上楼后发现,那对各楼层的房与房间之间,四面相对,颇像一口深井,若大吼一声,必有回音……这一建筑结构,正好暗合了申报馆的历史:深不可测,魅力无限。

前些日子,听说“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”在杨浦周家嘴路开馆,我就想,假如它开在申报馆,那该有多好!

# 笔会

绿色和玫瑰色  
和声: 音乐室  
(油画)  
惠斯勒



“文汇报”  
微信公众号

# 伏天去南郊庄行

杨扬

荡着羊肉的香气。问了厨师才知道,庄行伏羊节,用的是崇明的白山羊,一般是养了一年以上的,做法是清炖。据说羊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是软肋部位。回庄行的路上,太阳升起来了。水杉行道树像撑起无数把绿色的遮阳伞,形成长长的甬道。两边是铺展开去的稻田,稻田上漂浮着朦朦胧胧的晨雾。有白色的水鸟在不紧不慢地绕着,欢快地鸣叫。望着这满眼的绿意,我体会到古诗所说的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田园乐趣。

回到庄行,过八点了,安静的村镇忙活起来。水果蔬菜集市热闹非凡,村里的羊肉馆也早已开张营业。站在广场,可以望见羊肉馆二楼的食客们临窗而坐,一排一排,一桌一桌,白色台布,干净整齐,食客们端坐着享用美食,很有仪式感。九点伏羊节开幕,上海轻音乐团前来助兴,在广场劲歌热舞,高亢的歌声招来远近的乡亲和赶热闹的朋友。很多路过的司机将车停下,跑进来观看精彩的伏羊节表演。节目的高潮,是一大锅羊肉开锅,一群男女宾客将翠绿葱花的撒入羊锅。开幕式结束,主办方将一碗碗羊肉汤端给到尊贵的宾客面前,请大家尝鲜,一边还有白酒免费品

尝。四面八方的来客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,围在一起,吃吃喝喝,说说笑笑,其乐融融,人气爆棚真是一点不假。一些路过的行人也是喜笑颜开,连声说:好热闹啊!热闹好,好几年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!一边的组织者也是殷勤地邀请宾客和路过的行人,进来品尝美食。我完全被这节日的欢乐气氛所感染,好像这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已经与自己的生活久违了。不参与伏羊节,真是无法体会民间节庆的乐趣与感染力。没有想到在这大热天,人都懒得动的日子里,上海近郊还有这么热闹而快乐的伏羊节。气氛一热烈,人开心起来,什么酷暑烈日似乎都不觉得了。我走到路过的果园,看果农们将一筐又一筐新摘下来的青瓜和西瓜运过来,在遮阳伞下招呼经过的小车停下来,出售给他们。望见果园深处,有无数挂满枝头的蜜梨和黄桃,我问果农,这蜜梨和黄桃有什么讲究?他们告诉我,还有十天,蜜梨就熟了,可以上市。我想起以往每年都收到汤君寄来的蜜梨,没想到上海的蜜梨品质这么好,肉质细腻,水分充足,甜度也高,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蜜梨。而对于黄桃,印象中似乎是做水果罐头的材料,但果农告诉我,这里的

梅雨结束,上海就进入伏天了。酷暑猛如虎,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走到哪儿,都是热烘烘的,温度直逼40度。人在街上走,像是走在金星的沙砾上,脚掌发烫,整个身体的感受,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桑拿室,热浪一阵接一阵,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没办法,最好的避暑是在家待着,吹空调、翻闲书,尽可能减少外出。但谁能长久享此清福呢?为了生计,还得出门奔波。就在这城里苦苦煎熬的时候,朋友汤君来电,说是上海奉贤庄行举办伏羊节,让我过去看看。一听这话题就去吃伏羊,我的心里就有点恐慌,回忆也是苦涩的。十多年前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考察活动,经过安徽萧县,正好赶上伏羊节。我对伏羊不伏羊根本没有印象,只是觉得夏日酷热,原本就热得难受;羊肉也是热性的,还要加上烧酒助推,这不是火上浇油么?无穷热量叠加在一起,吃进嘴里,叫一般的人身体怎么消受得了?但那时年轻,人乡随俗,就随大伙儿进了饭店,加入到伏羊节的吃喝行列中去了。这次吃喝的惨痛后果,就是上了高铁后,觉得头疼欲裂,昏头昏脑回到家,第二天浑身是因过敏起的红斑。去医院看医生,医生二话没说先查过敏源,查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,最后配了几盒清热解毒丸,服用一星期后,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有过这番难忘的经历,我明白夏天是不能过吃羊肉的,尤其是吃什么羊肉烧酒强身健体之类的说辞,我不太相信。但暑期经过菜场,的确见到一些饕餮之徒,一大清早就在羊肉馆里喝烧酒,这烧酒还不是上等的白酒,基本上都是土烧。他们喝着烧酒,吃着羊肉羊杂,拉着家常,说说笑笑,快乐无比,差不多天天如此,好像也没见他们身体有什么不